读方孝孺《深虑论》

□李升泉

据说，当年林彪出逃乘坐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后，毛泽东为接班人问题苦苦思虑，有人向毛泽东推荐了方孝孺的《深虑论》。毛泽东说，方孝孺自己被灭十族，何谈深虑？弃之不读。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吧，《深虑论》声名不彰，读过的人不多。作为领导干部，还有那些当今事业成功、家资宏富的企业家和巨商大贾，读读这篇《深虑论》，对如何对待人生，如何对待钱财，如何对待子孙家族，或许会有一些教益和启发。

方孝孺作为帝王之师，他所说的“深虑”，是天下之虑，帝王的家国之虑，也是为子孙的身家之虑。

首先，他认为，考虑天下的人，总是把很难的事、自己不放心的势力和人，思虑、预防得很严密很周详；但祸端却常常发生在那些恰恰被忽略的地方。他认为，这其实不是考虑周密不周密的问题，而是天道，是人的智力所难以企及的。

其次，方孝孺用中国历朝兴亡更迭作为例证，说明即使拥有无限权威、可以动用无限资源的帝王，要想保住帝位世代不变，仅着眼于防，不管心思多么缜密，也是防不胜防的。秦得天下，汲取了周朝诸侯太强的教训，实行郡县，但灭秦的刘邦却起于陇亩蒿莱；汉汲取秦不封诸侯而速亡的教训，大封刘姓王，却出现了七王之乱；唐太宗听人预言说姓武的人会杀其子孙，于是尽除姓武的臣属，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杀他子孙的这个人，就是服侍在他身边的媚娘武氏；宋太祖汲取唐末五代武人割据称雄的教训，尽削领军将领之权柄，以至于金兵南下无兵可御，徽、钦二帝城破被掳。这些结果，总是出现在当初那些开国帝王们深深的思虑之外。

最后，方孝孺认为，难道是这些作为一时雄杰的帝王们聪明不够、思虑不周吗？当然不是，世事的发展变化，圣人也是没有办法预料的啊！这里我们看到，对身后事的“深虑”者，历代帝王，都是具有过人之智，盖世之才，百代之功，无往不胜，无攻不克，造就了辉煌的生平业绩。也因此，他们高度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安排决定百年之后的事情，但形势比人强，世事的变化是任谁也不可抗拒的。这些不世出的伟人尚且不能，何况仅有一点小功小成之人？

当然，方孝孺的《深虑论》，是讲给旧时的帝王听的，用心殊为良苦。儒家不是不可知论者，方孝孺这里所说的天道，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其实就是规律，是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天道不可违，规律不可抗，掌权者要对人心有所敬畏，对规律有所敬畏。所以，方孝孺认为，真为后人计、为子孙计，唯一能做的，就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守住“万变不离其宗”的“宗”。这个“宗”，就是方孝孺所说的“德”，这也体现了儒家始终一贯的“德治”理念。治乱之世，事功之人，可能视“德”为迂腐之论。但人间社会，真正起作用的、长久起作用的却只有“德”。可以想想，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取代这一个“德”字吗？

那么，“德”是什么呢？其实，儒家思想里的“德”，对普通人来说，就是社会的公共底线；对政治家来说，就是为政施策必须遵循的最一般的规矩和原则；对掌权者来说，就是对规律的顺应和对人心的敬畏；对社会治乱来说，就是民众对统治耐受力的基本限度。这个“德”字，中国社会讲了几千年，兹事体大，不论什么时候，修身、齐家、治国，都不可不察！即使在今天，居权势要津之人，要善始善终，不出问题；商企巨富之室，要绵延承传，相对久长，能起作用的还是要守住一个“德”字。具体说，至少有三点需要体会深思。

一个是，时势变化中守住方向。世情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变化之中。一个有智慧的人，可能对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有充分的预见和把握，因此，顺应得当，应对成功，人生事业成功。但一个时代的具体应对策略方法，是无法传承的，是不可能运用到另一个时代去的，生搬硬套，就成了谬误；没有看清变化，举措失当，也必然得其反面。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在生活和人生中守住的方向。这绝不抽象，关乎每一个人的行为选择。比如，领导干部思虑的重点是应该放在为党尽责上，还是放在个人退休后和身后之事上，领导干部应该如何处理为党的事业计和为后世子孙计，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应该怎样对待巨大的财富，应该怎样选择资本的投向和领域，等等。我们看到，那些被曝光的大奸巨贪，其实都有着很高的智商，有的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不小贡献。他们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从根本上说，就是错估了形势的发展，误判了党的改革走向、自身纠错能力和人民对贪腐的容忍度，以至于在社会转型发展中方向迷失、走向了覆亡的邪路。

另一个是，“天道”难测中守住底线。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还不能排除发展的反复和偶然性干扰，因此古人认为“天道”难测。但社会既然是由人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交往方式，则是相对稳定的。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与人、集团与集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必然会出现利益的交集，这种交集的纽结点，就成为法律。法律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硬性调节和规范，它是社会的最底线。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相对宽松的道德底线。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组织和团体之间必然会发生关系，这个关系的交集点就是道德。道德其实是出自基本人性的考虑，是对人性弱点的软性约束，也是对社会基本关系的软规范。无论相对于人性，还是相对于社会组织，道德比法律更基本、更深刻，也更为稳定。正因此，我们无论是一个成功者还是一个普通人，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求我们的子女，都应做到变中守法律，变中守道德。做到这些，才是真正长远之道、深虑之策。

再一个是，智慧有限中守住节操。在中国传统文化那里，气节操守是官员“德”的核心内容。气节，就是忠诚于信仰；操守，就是忠诚于职责。除去意识形态因素不说，信仰、操守任何时候都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既然无法完全预测社会的变化发展，既然无法做到准确地应对人事世情，我们就必须把一些基本的东西守住。人无信不立，事无责不成。没有信仰，怎么可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呢？做事没有责任意识，事情怎么能够成功呢？许多人和事都告诉我们，不恃聪明，不称智慧，不弄技巧，而察趋势、明大道、守根本，秉持住基本的原则，以此立身，以此传家，以此遗子孙，方可保事业长久，子孙无虞。

所以，方孝孺不是让我们不要深虑，而是要从更深一层上去虑，从“天道”、规律上去虑，从“德”、从底线上去坚守；多虑方向性的东西，多虑根本性的东西，多虑真正长久的东西。如此，才是真正谋深虑远啊。

有所思

王罕化解上访积案

□张晓政

北宋仁宗至和年间，刚刚调任潭州知州的王罕一上任就遇到了一起上访案件。

拦住王罕喊冤的是一位老妇人，还在她试图接近王罕的时候就被众多衙役迅速架开了。在老妇人哭天抢地的叫喊声中，在王罕充满讶异的眼神中，身边的人向王罕解释：“这是一个疯子！只要有官员出行上路，特别是得知新知州到任，她便过来拦驾喊冤。之前也询问过几次，但她语无伦次、颠三倒四，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味吵闹，不过是一个疯婆子罢了，请大人不必理会。”

身边的人异口同声、言之凿凿，看起来的确不像是一个因为官官相护而有意隐瞒的冤情。对于这一场意外，似乎确实不必放在心上。

但王罕却是一个以认真出名的官员。还在他担任宜兴县令时，就因为明察秋毫勘验湖田，被上司范仲淹所注意，奏报朝廷在天下推广他的工作方法。事实上，王罕的仕途生涯，不论是在何地何职，向来有胆有识、体恤民情，这样的人，对任何发生在百姓中间一丝一毫的异常举动都从未放过，这一次也不例外。

王罕当即命人将老妇人请到官衙，亲手端上热茶，相向而坐，嘘寒问暖，亲切询问，请老人家详诉其情。诚如旁人所言，这位老妇人说话言语不清，十句中倒有九句不知所云，时不时还夹杂一些令人难以入耳的咒骂声。但王罕既不恼怒，也不烦躁，而是耐心倾听老妇人说完后，再从其言语里的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反复追寻盘问。在王罕的鼓励与引导下，老妇人说得越来越流利，越来越清晰，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一点一点浮现出来。

原来，这位老妇人年轻时为人正室，无子，其夫另有一妾，妾生有子。其夫死后，老妇人被妾驱逐，家产悉为妾所掠之。老妇人愤而告官申诉。起初的情形已无从探究，或许是当时的知州受人蒙蔽贿赂，又或许是老妇人情急之下多有冲撞冒犯，总之，老妇人的诉求被驳回了。老妇人几次争辩未果，竟至愤恚发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精神受到刺激，从此恍恍惚惚、异于常人。此后但凡有知州就任，老妇人都要赴官喊冤，但因其言语不清，加上情绪激动，稍有不满，便张口詈骂，因此都被人认为是疯子。后来的几任知州“以其狂”，只要见到她，即命“屏逐之”，避之唯恐不及，又怎有耐心听她诉说？久而久之，老妇人的冤屈不但得不到伸张，甚至已无人知晓她到底因何事而喊冤。十几年甚至可能几十年下来，这竟成了潭州的一起“无头冤案”。直到此次王罕上任，才总算弄明白了这起上访积案的来龙去脉。

事情既已弄清，王罕当即下令重新调查此案，不久便判定返还老妇人家产并对妾予以惩处。说来也奇怪，老妇人冤屈得伸后，精神竟渐渐好转，从此不再发狂。这件事情迅速传遍了潭州，吏民皆服王罕之神明。王罕也因为此事受到朝廷嘉奖，并调任明州知州以示重用。

王罕所化解的这一起上访积案，事情看起来并不大，案情也很简单，但司马光在为撰写《资治通鉴后纪》而准备的史料汇编《涑水记闻》中却详细记录了此事，后来的《宋史》在为王罕作传时也予以了采用。可见著史者对于这一件小事的高度重视。难道是他们小题大做吗？当然不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透过这一件小事，正反映了古人对于官员为官之道的思考。

为官以为民，是古人对官员为官之道的核心要求。如何为民呢？这当然需要有为民之“能”，但是，光有“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为民之“心”。如前所说，王罕所化解的这一起上访积案并不复杂，解决起来也不需要多么高明的智慧与能力，但为何之前几任知州都束手无策、茫然无计呢？原因在于或许他们并不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却缺少真诚为民的情怀。事实上，在他们面对老妇人或者类似遭受冤屈的百姓时，他们不是心生怜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感同身受，而是厌倦厌烦，只想赶紧将事情处理完毕、将这些人打发了事。一句话，他们心里并没有真正装着百姓的安危冷暖，在事情顺利的时候，可能也会做出一些政绩，但一旦出现波折或者困难，就会显现出极度的不耐烦，潦草应付，甚至推诿躲避。不论是司马光还是后来的著史者，显然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才会将王罕的这一件小事郑重记录下来，意在告诫其他官员：为官之道其实并不难也不玄妙，只要有一颗为民之心，真心诚意为百姓排忧解难，许多问题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也才会迎刃而解。这个启示，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仍然有着深刻的警醒意义。

庆历新政何以失败

□陈　良

自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以后，北宋进入比较安定的和平时期，至宋仁宗庆历年间，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俨然一派盛世景象。这时候，宋仁宗满以为能够解决西夏的边患问题，于是北宋与西夏进行了全面战争。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北宋军队三战皆败，同时国内还出现诸多兵变、叛乱和民变事件。

宋仁宗并非昏君，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他没有无动于衷，而是力图化解危机。庆历三年（1043年），宰相吕夷简病退，宋仁宗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让他们主持朝政，“兴致太平”。当年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这便是史称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主要体现在范、富二人所提出的十项主张里，具体内容分别为：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推恩信；十曰重命令。

不难看出，以上“药方”可谓对症下药，意在整饬吏治、厉行法治、富国强兵。除了恢复府兵制，因“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大多主张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得以施行。

庆历三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考察，自己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他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将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替他担心，于是婉言提醒：“您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在痛哭呢！”范仲淹坚决地说：“一家人哭，岂能与一路人哭相比。”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庆历新政所推行的种种改革，在方方面面或多或少触犯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尤其是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因此，不肯让权让利的保守势力十分痛恨新政，以致迁怒于新政的主导者及支持者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并试图将他们赶下台，逐出朝廷，以中止新政。

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叫夏竦，他是一个资深大员，曾做过镇守西北的主帅。宰相吕夷简病退时，他以为凭资历自己可接任宰相，没料想在欧阳修、石介的批评下，不仅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职位也得而复失。于是他恼羞成怒，把矛头指向改革人物，给予猛烈攻击。他串通保守势力，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的流言，还勾结太监在仁宗面前进献谗言，诬陷范仲淹私树党羽。一时间，关于“朋党”之说甚嚣尘上，范仲淹等人感到压力很大。

孔子说“君子不党”，反过来说，结党者即为“小人”。夏竦等人指责范仲淹等人结交“朋党”，意在将范仲淹等改革人物划为“小人”。既然是结党营私、品德恶劣的“小人”，那么驱逐或法办他们就是理所当然。此外，夏竦之流还懂得，封建帝王对“朋党”最为敏感，如若大臣拉帮结派形成“朋党”，势必弱化其权威，甚至危及其统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坐大？所以，只要不是白痴，任何帝王都不容许身边有“朋党”存在。可见，扣“朋党”帽子的用心，无非是挑动帝王敏感的神经，借帝王的猜忌与疑虑，给对手以致命打击。

面对政敌抛出“朋党”之说，范仲淹非但没有胆怯退缩，而且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与此同时，欧阳修特地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重新诠释“朋党”之说，声称君子有党，“以同道为朋”，“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时说：“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答对：“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对于范仲淹、欧阳修的君子有党之说，宋仁宗半信半疑，摇摆不定。最终由于夏竦使出小人的伎俩，促使仁宗下定决心，于庆历五年初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逐出朝廷，为期一年四个月的庆历新政不幸夭折。事情的起因是，夏竦让家中一个使女天天临摹太子中允石介的笔迹，等到能够以假乱真时，便伪造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借题发挥，传播流言，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阴谋另立皇帝，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也许不相信流言，但是他不得不有所顾虑，毕竟保住皇位才是他的核心利益。为此，他只好做出痛苦而无奈的决定，打发范仲淹等人到地方任职，并中止新政。

回头反思，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也是情势使然。当时情势是，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涨，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

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并且延宕到南宋时期。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儒家思想观念存在漏洞，朋党之说基于君子与小人的观念：君子不党，小人结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而且一种学说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极具杀伤力。范仲淹、王安石都先后中枪，导致新政、变法失败，一个安于现状而不能锐意改革的北宋王朝最终被金兵打垮，丧失半壁江山。

史　镜

何不起用檀道济

□游宇明

皇权时代，一个人做官无非两种情形：一个是走正途，即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入仕资格，另一个是通过捐钱或朝廷的破格选拔获得任用。清政府对汉人多采用“走正途制”，对满人多采用破格选拔制，因此出现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情。

光绪年间刑部尚书刚毅就闹出过笑话，每当监狱报来狱囚瘐毙者，他一律将“瘐”改作“瘦”。后做兵部尚书时，四川总督奏报追剿藩夷的奏折中，有“追瘐逐北”之语，刚毅认为这是“追奔逐比”之误，意谓追比藩夷掠夺之物也。

在八旗官员里，刚毅的名声不算太坏，虽然他当兵部尚书时，做过怂恿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的傻事，但他在山西、江苏等地做巡抚时，也有过在黄河河套屯田并设官管理，疏浚上海蕴藻河、之类的德政，受到老百姓的好评。其文化素质在满族官员里不是最低的。

另一些满族官员闹的笑话更让人捧腹。清朝旧例，各部院满员即使目不识丁，亦可保送做御史。御史是干什么的呢？一是纠察，即弹劾腐败官员；二是进谏，即向皇帝提些合理化建议。一些满族御史完全不能执笔，一旦需要上书言事，就需要别人捉刀。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有一天早朝，大臣王懿荣在午门外与人聊到军事，大叹一口气说：“事情太危急了！非起用檀道济做大将不能扭转时局。”檀道济是南朝宋之将领，跟随刘裕父子出生入死，屡立奇功，后被封为“征南大将军”。王懿荣是用此人比喻曾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并平定南疆阿古柏骚乱的董福祥。一满御史在旁边听到了，立即问王懿荣檀道济三字如何写，王懿荣将这三字写给了他。第二天，该御史向朝廷上奏请求起用檀道济。过几天，又有一位满御史上奏说：“日本东北有两大国，一叫缅甸，一叫交趾，领土大于日本数倍，日本畏之如虎。请派一个能说会道的大臣前往这两个国家，与之订约，共同向日本发起进攻，此事一定成功。”上奏言战事，却将历史人物当成今人；希望联合别的国家抗日，却连人家的位置与基本情况都没摸准。这些满族大臣真够上世界幽默大典了。据说光绪帝看到这两份奏折后大发雷霆，准备降旨斥革，恰好恭亲王奕訢在旁，劝光绪帝不要降旨，说这样会让满大臣益发被天下所轻，光绪帝才作罢。

满族是个马背上的民族，尚武不尚文，对于孩子，八旗人会不遗余力地教其学骑射，却很少要求其学文化。原因很简单：学好了骑射可以当兵、做将军、成为部落首领，而文化好，顶多也就是做个教书先生、文书什么的。孩子天性是贪玩的，既然大人对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上的要求，他们自己当然也不将文化当回事。

一些满族大臣胸无点墨也与清代统治者狭隘的“主子”意识相关。清代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对汉人始终充满警惕。满人与蒙古人有了军功，可以封侯封王，但汉人有了军功，“生不封王，死不封侯”。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让清政府的所谓“龙廷”可以继续坐下去，按封建道德的标准，说功勋盖世绝非过誉，可是以慈禧为总头子的清政权也不过封他“一等毅勇侯”，连公爵都没给。清代汉人占全国人口90%，满人不到3%，但在各部大员中，就要分出汉尚书、满尚书、汉侍郎、满侍郎，比例对等，大学士也是汉满各六个，目的是让满人牢牢掌握控制权。满人做官如此容易，又深得最高主子信任，自然也就没有读书、做学问的内在动力，施政、上书言事闹笑话不足为怪。只是，这样的人多了，清政权覆亡也是迟早的事。

中华春秋